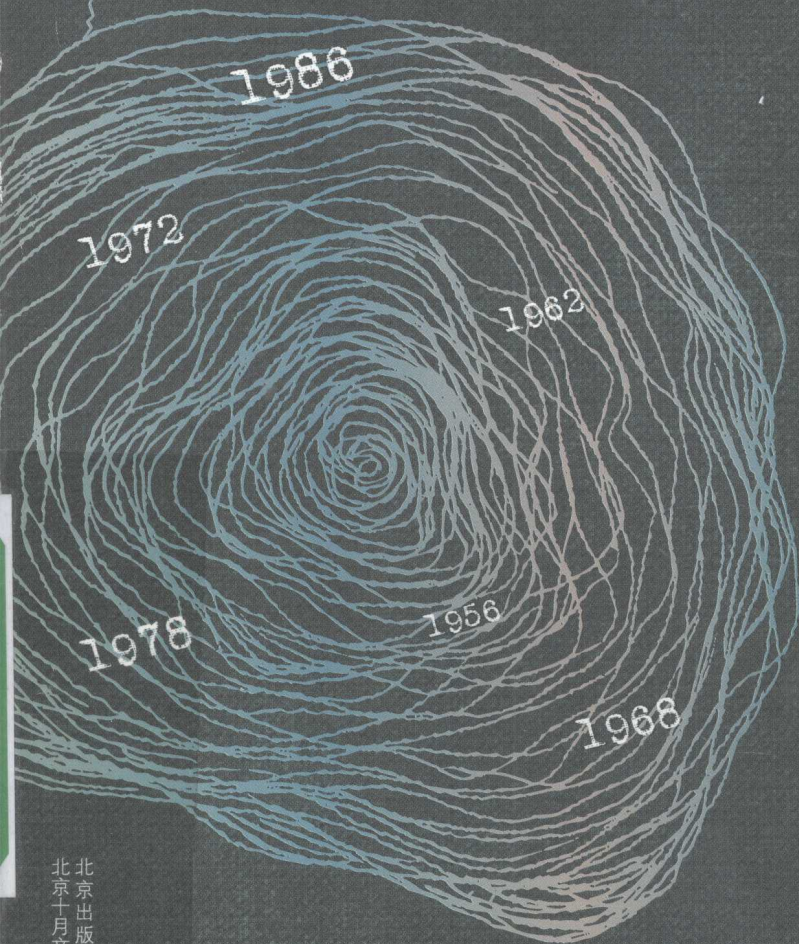


李洁非◎著

当代中国的思想轨迹

年度型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B26/48

2013

当代中国的思想轨迹
年度典型

李洁非◎著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C00342109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典型年度 / 李洁非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302 - 1312 - 4

I. ①典… II. ①李…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9856 号

典型年度

DIANXING NIANDU

李洁非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90毫米×1270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300千字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312 - 4

定价: 39.8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几点说明

1

本书的起因，是几年来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渐渐感到，所涉现象及问题，往往不能在文学层面求得最终解释，为探其究竟，乃广泛搜读一切有关的尤其是精神思想方面的材料，从而积起一些印象和思考，并产生加以说明的愿望。

2

笔者自知，无论以目前的学力和精力，尚不足胜任一部完整的中国当代精神思想史的写作。然而，本书所以采取年度史的框架，并非只因力有不逮。就行文的意趣而言，笔者坦言并不欣赏学院式的做派，回避从事那种格式刻板的著述。在可能的情况下，笔者愿意尽量娱怡读者的阅读，至少不去增加他们的排斥感。

3

本书取法散点透视，来提供当代中国的一种思想轨迹。以年度为横断面，挑选几个重要时间点，深度解析。这工作方式，大抵如

植物学家绘制剖面图，亦可比之为医生在显微镜下做活体组织检查，抑或是地质家给矿物进行断层扫描。要之，意在窥一斑而知全豹。不妨说，里面有取巧的因素。然而，正如中国人物画较诸西式人物画，亦非一无是处，“眉间二三笔，传具凛然之色”，笔断意不断，未必都画得满满实实为佳。

4

对于完整性方面的欠缺，本书通过局部观察的细密来加以弥补。笔者虽无力透彻研究六十年的每一年，但对于挑选出来的几个年度，辄力争摸清说透。一是因为这种工作量犹可承受，二来对所选择的几个年度笔者以往即做过一些功课。这种局部上的细密乃至厚密，目前来看，尚堪人意。

5

一共写了六个年度，1956、1962、1968、1972、1978、1986。为何是这几个年度，而非其他？毋待赘言，见仁见智而已。换一位作者，所选与笔者或有交叉重合之处，但想必不会完全一致。其次，也须点出一条：本书所选所写确实反映了作者的观点，但本书未选未写却未必表示作者认为不重要。写作，受制于多种因素，或主观或客观，有条件成熟者，自然也有不成熟者。当然，有的分歧或许难免。比如1966和1976，一是“文革”爆发之年，一是“四人帮”倒台之年，却都未纳入本书，倘遭质疑，亦颇自然。但以笔者看，从政治角度它们非选不可，若论精神思想轨迹的意义则分别比不上1968年和1978年，理由尽见书中。

6

2008年,《典型文坛》出版以后,反响尚佳,乃有成其“典型”三部曲之想。2010年,《典型文案》印行,现在又有了这本《典型年度》,三部曲算是凑齐。然有一点不在料中,亦即煞尾之作居然跟文学基本无关。不过,“无关”只是表层。当代文学史搞深搞透,恐怕非进展到精神思想层面不可。几年跋涉,笔者最终得到的是这一认识。

7

当着三部曲终要出齐之际,想特别地提及两家文学杂志。先是《长城》杂志于2007年,然后《钟山》杂志于2008年,分别为笔者辟设专栏,此后至今,未尝中辍。四年内,大家携手一道将《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典型年度》所有篇章推之于世,总字数计逾百二十万。这些文章因内容容量之故,篇幅不菲,长者曾达五万余言,最短也未低于二万。两家杂志的主编李秀龙兄、贾梦玮兄一向慷慨支持,例未吝惜版面。际兹整个写作收束之时,抚思所来,油然想起古人文中的一句:“感荷厚意,曷日而忘?”谨献于二刊。

李洁非

2010年9月27日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就是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从而中断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使我们党和国家长期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阶级斗争连续不断并逐步升级，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错过了不少宝贵的发展时机，影响了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目 录



几点说明 1

1956：忽然焕发的朝气…3

1962：冬天的童话…77

1968：复调与变奏…157

1972：国家与革命…215

1978：新牌桌，新开局…273

1986：“时代”三棱镜…337

后记 402

附：可供参读的资料 407

B26/48

2013

当代中国的思想轨迹

年度型

李洁非◎著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C00342109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56

突然焕发的朝气

1920

戶部調查報告

胡风派，丁玲宝黛，对会公代牙痛痛直中书王登语直新新中书一室
那请胡风派等”。宝黛的并去丁玲派；胡风完全，美有胡风派要
胡风完全及胡风派，相同”。胡风派公出胡风，胡风派公出胡风，胡
胡风派中，天罪。月11日毛平派至胡风派的时候，宝黛。胡风派胡风派的
胡风派。胡风派至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中胡风派胡风派
一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
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
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
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
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
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
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胡风派

在宝珠胡同妇联礼堂开过二十几次批判会，每人都得发言。
我也不记得自己发了些什么言，忙了一阵，把他们几个定成反
党集团；可还未完全定案，忽然又来平反。中宣部新来的秘书
长李之珪主持其事，与作协新来的杨雨民配合。他们找当时的
发言人一一谈话，要求订正原来的发言，于是这件事看起来又要消解了。

“批判会”对象是丁玲、陈企霞。胡风事件后，全国开展肃反运
动，中国作家协会于1955年8月初启动了对丁、陈的批判。宝珠胡
同的批判会，据黄秋耘《风雨年华》，准确次数应该是十三次。韦君
宜的记忆，大概是批判有如车轮大战、过于频密造成的。

值得品味的，是“忽然又来平反”一句。1956年6月28日，陆

定一在中南海喜福堂主持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确定对丁、陈问题要重新查对事实。会议纪要上记载了这样的决定：“将事实调查清楚，并听取各方面意见，再提出处理意见。”同时，决定恢复陈企霞的党组织生活。其实，最初的变化呈现于5月11日。那天，中央肃反领导小组通知中国作协，已经查清陈企霞没有反革命问题。随即解除了对陈企霞长达二百七十七天的隔离审查，使其自由。这样一来，先前对丁、陈的处置，自然都发生疑问，陷于被动。作协党组负责人刘白羽承认，去年将丁、陈问题上报中央时，工作太忙，没有查对事实。从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决定重新查对事实那一刻起，丁、陈问题实际上已经转到了“平反”的方向。较诸去年紧锣密鼓的高压批判态势，可谓急转直下，所以韦君宜以“忽然”相形容。

岂啻丁、陈二人命运有此“忽然”之变。1955年春、夏大逮捕中下狱的不少“胡风分子”，到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初这段时间，亦“忽然”纷纷获释。例如，孙钿于1956年6月底出狱，李正廉于1956年8月出狱，何满子、王戎于1956年9月下旬出狱，化铁、胡征于1956年11月出狱，彭柏山于1956年12月中旬出狱，王元化于1957年2月下旬出狱。

“忽然”接踵而来，反而说明非出偶然，而一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

2

事情可以追溯到1955年末。

1955年12月6日，毛泽东为一个有关肃反运动的文件加写了几句话：

在肃反运动中，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超过这个控制数字的，必须得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有些要得到中央十人小组批准。（《在中央十人小组关于目前肃反运动应注意事项的通知稿中加写的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

事后看，这段话释放了肃反运动要“收”的信号。然而，信号非但未被准确接收，反而把意思弄拧了，“这个控制数字后来竟成了要达到的目标。有些单位更加扩大化了。”[黎之：《回忆与思考——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宣传工作会议”（1956年1月—1957年3月）》，《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但也不足为奇，按照几年来一直保持着高压的思想态势，下面的人对于运动和斗争采取宁“左”勿右的表现，是相当自然的。

十天后，毛泽东只好把意思说得具体一些：

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予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

这是12月16日写在《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的话。依这样的尺度，肃反对象里简直就不包括知识分子。通常而论，知识分子能够犯的错误，很难超出“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这种层次。他们无非在这样那样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观

点，发表一些个人言论而已。其实，即便“胡风集团”，顶多也是“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何曾有过查实过的“反革命行为”？

现在，毛泽东突然表示，上述情况“不应该”“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较之于数月以前，实是重大的政策调整。

尤其要注意，这并不是一个随机性的想法，而是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出现的。亦即，中央正在重新考虑知识分子政策，已经形成草案，准备出台。

毛泽东批示后，草案即刻发往“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各党组，总政治部”，要求他们在1956年1月10日前讨论完毕并将意见上报中央。毛泽东同时预告，收到各地意见后，中央便将召集会议，研究和重新确定知识分子政策。

为什么提出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在毛泽东批语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论述：“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回顾并批评说：“过去六年中，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要求“中央组织部应当负责订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年度计划和几年计划”。

显然，中央感觉到了“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的必要，准备将它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其次，在此基础上对于“过去六年”亦即解放以来的知识分子工作予以整体反思，认为这项工作存在偏差。

毛泽东亲口指出从1949年到1955年间，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如此明确的批评，应非

信口开河，肯定会有实际数据。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和敌意一直很严重。

的确，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知识分子，首先视为改造和批判对象，打“兴无灭资”攻坚战。所以如此，则基于两点认识：第一，知识分子主要是资产阶级学校培养起来，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第二，知识分子一般出身较优越家庭，思想感情上有剥削阶级根源。

以文艺界为例，1951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胡乔木在动员大会上作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报告。他说，即将开展的“文艺工作方向的学习”是“迫切需要的”；运动将起到“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作用。为什么这个运动是“迫切需要的”呢？报告说：

虽然一九四九年七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已经宣布了接受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指示的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不经过像一九四二年前后在解放区文艺界进行过的那样具体的深刻的思想斗争，这个方向就真的会被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所自然而然地毫无异议地接受。一部分在一九四九年大会上举过手的作家，并没有真正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的内容，他们对于文艺工作仍然抱着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见解。所以当听说我们的文学艺术要以工人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去教育全体人民，去批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因此也就要以工人阶级的文学艺术观去批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观的时候，他们就惊异起来，觉得似乎是“方针变了”。而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其中甚至也包括少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示过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的共产党员。这